

《史记》讲读

张苏榕 编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史记》讲读

张苏榕 编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镇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记》讲读 / 张苏榕编著. —镇江: 江苏大学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7-5684-0576-8

I. ①史… II. ①张… III. ①中国历史—古代史—纪传体②《史记》—研究 IV. ①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97751 号

《史记》讲读

Shiji JiangDu

编 著/张苏榕

责任编辑/徐子理 董国军

出版发行/江苏大学出版社

地 址/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邮编: 212003)

电 话/0511-84446464(传真)

网 址/http://press. ujs. edu. cn

排 版/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718 mm×1 000 mm 1/16

印 张/17.25

字 数/363 千字

版 次/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84-0576-8

定 价/4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电话: 0511-84440882)

盐城工学院教材基金资助出版

目 录

上编 导 论

- 一、司马迁的时代、家世与生平 / 003
- 二、《史记》的体例与写作宗旨 / 009
- 三、司马迁的思想 / 012
- 四、《史记》的文学成就 / 019
- 五、《史记》的地位、影响和历代《史记》研究 / 030

下编 作品解读

- 项羽本纪 / 035
- 高祖本纪 / 060
- 吕太后本纪 / 092
- 赵世家 / 103
- 留侯世家 / 131
- 陈丞相世家 / 140
- 绛侯周勃世家 / 148
- 管晏列传 / 157
- 李斯列传 / 164
- 淮阴侯列传 / 183
- 魏其武安侯列传 / 198
- 李将军列传 / 217
- 游侠列传 / 227
- 太史公自序 / 237

上编
导论



一、司马迁的时代、家世与生平

司马迁(约前145年至约前89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市)人,是中国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关于司马迁的生平,主要见于《史记》中的《太史公自序》和班固《汉书》中的《司马迁传》。《司马迁传》中附有司马迁写给朋友任安的一封回信,即《报任安书》,在这封用血泪写成的信中,司马迁陈述了自己为完成《史记》而在遭受宫刑后忍辱活下来的心路历程,成为后世了解司马迁的生活、理解他思想的最重要的资料。生年采用王国维的《太史公行年考》提出的“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的观点。王国维认为,“司马迁卒年虽未可遽知,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也”。此语屡见征引,已成为没有定论的定论。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赋八篇,今仅存《悲士不遇赋》。《悲士不遇赋》是其晚年的作品,抒发了作者虽受腐刑却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激情绪。传世的文章还有《报任安书》和《与挚伯陵书》,尤以《报任安书》最为知名,该文被班固收入《汉书》。

(一)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

司马迁生活于西汉中期,这是大一统汉王朝的鼎盛时期。司马迁之所以成为令后人敬仰的史学巨匠和文学大师,绝非偶然,有其特定的主客观必备条件。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表现出的渊博学识、深邃思想、雄放气魄和悲悯情怀,都与西汉武帝时期的时代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孕育伟大史学家的汉武盛世是个怎样的时代呢?

西汉立国之初,接手的是一个饱经战乱创痛的天下。在经历秦末大动荡和楚汉相争之后的汉初社会,经济衰落,人民疲困。《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亦言:“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面对这样的疲敝现实,统治者审时度势,顺应时代和人民的要求,推崇黄老之术,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汉初一系列宽缓的政策和措施,

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和劳役负担,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使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汉初的统治者接受了秦亡的教训,放宽刑罚,使人民从秦的苛法中解放出来,缓和了社会矛盾;废除“挟书律”“妖言令”,更使深受思想桎梏的人们从秦朝的文化专制中解脱出来,使各种思想能在汉初宽松的社会风气中兼容并存。经过七十余年的“无为而治”,整个社会逐渐全面复苏,百姓与国家的元气得以恢复,出现“文景之治”的盛世。汉武帝即位后,一改汉初“无为而治”的国策,锐意进取,积极有为,西汉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汉武帝时,社会达到空前强盛。“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俟而不得聚会。”(《史记·平准书》)经济的繁荣不仅促进西汉社会的稳固,而且促进了学术文化的繁荣发展,这些都为司马迁撰写《史记》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西汉国家政体为郡国并行,中央集权而不废封建。立国之初不仅大封诸刘,还封了七个在楚汉战争中立有大功的异姓王。诸侯国拥有军队和财政、税收等权力,是国中之国。汉高祖为稳固江山,逐个剪灭异姓王,汉景帝时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汉武帝时期,加紧钳制和削弱诸侯国势力,实施“推恩令”“左官律”“附益之法”“酎金制”等措施,使诸侯国比例与汉初相比大为减少,彻底地解决了王国割据势力,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得到空前强化,为中国全面进入封建专制社会奠定了基础。内朝制的设置与内朝集团的形成,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封建君主专制空前强大。但是,随着诸侯国势力的衰弱,士人游宦诸侯国的战国遗风宣告结束。士人不得不从地方涌向朝廷,生活在大一统的皇权政治格局之下,生死穷达系于皇帝一人之身。

随着西汉国力的强盛,汉武帝时期的对外政策也由汉初的柔和忍让逐渐变得强硬。卫青、霍去病等一代名将受命征伐,四夷臣服,大汉帝国威名远扬,奠定了泱泱大国的地位,实现了空前的封建大一统的局面。正是从西汉开始,奠定了今天中华的版图疆域;西汉是汉朝疆域最大的时期,北极漠北,西逾葱岭,东到朝鲜,南到大海。西汉版图的扩展,使得司马迁写作《史记》时,能把视野扩大到大宛、朝鲜、匈奴、西南夷等边远地区。但是,汉武帝的穷兵黩武、无休止的开边政策,劳民伤财,战争也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在思想领域,汉初统治者奉行清静无为的治国理念。这套统治策略对于克服秦苛政的弊端、恢复和发展生产、安定社会秩序,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长时间的“无为”和“姑息”,其政治弊端日益凸现,最典型的即在于君主无为而治,不利于中央集权;地方势力增长,渐成尾大不掉之势。董仲舒把诸子百家中的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形成了新的儒学体系。董仲舒的新儒学提倡“春秋大一统”“君权神授”等思想,这是一种截然不同于先秦的儒学,它以维护皇权的绝对性为目的,融政治、宗教、伦理、刑法为一体的实用主

义学说,因此也就迎合了汉武帝的需求。汉武帝大力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立起完整的社会统治思想。然而独尊儒学,仅仅依靠儒家的道德说教还不足以维护集权统治,因此,汉武帝在推崇儒学的同时任用酷吏,以重典治国。这就是汉武帝真正操持的统治之术——“霸王道”,即儒法并用,阳儒阴法。正如汉宣帝在总结西汉的统治思想时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西汉立国以来,政治上的无为之治对宽松、自由的文化学术氛围的形成有直接影响。吕后当政时废秦之“挟书律”。文帝即位,更加重视先秦文化典籍的恢复与整理。《汉书·艺文志》:“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汉武帝的即位,标志着西汉王朝极盛时代的到来,也标志着西汉文化高峰的出现。刘歆《七略》:“孝武皇帝敕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邱山。”《史记·太史公自序》:“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文化事业的开放发展为司马迁修史提供了充足的文献资料。在这种宽松的文化氛围中,学术的发展获得一定的自由。在著述方面,汉初以来,“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汉书·公孙弘传赞》:“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閎,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经学在此时奠定了深厚基础;政论文或纵横捭阖,或宏博深奥,是我国政论文的高峰;乐府诗成就堪与《诗经》比肩;“西汉两司马”——司马迁与司马相如,史学巨匠与文学大家同列一朝。

汉武帝时期出现了封建王朝的鼎盛局面,而这一时期又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问题。当时的主要弊政,一是刑罚太滥,治罪严酷;二是连年征伐和其他事项耗费巨额钱财,造成府库空虚,于是朝廷加重对人民的剥削,从而严重破坏生产;三是迷信鬼神,奢侈逸乐。这些弊政引起社会动荡,农民暴动接连发生。大汉帝国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下,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司马迁就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发展高峰的盛世。国力的强盛孕育了司马迁开阔的胸襟、宏大的气度和浪漫的情怀,但同时,大一统的君主专制,又使得司马迁深深感受到丧失自由的痛苦与悲哀;独尊儒术的思想禁锢,使司马迁深深感到精神独立自由的可贵与难求;君主的刻薄严酷,使司马迁痛彻地感受到人的尊严被践踏和蹂躏;对外的穷兵黩武、对内的残酷压榨,使司马迁亲眼看到所谓盛世外表之下的种种丑恶和层层危机。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最让人意气风发的时代,也是一个最让人苦闷、彷徨和绝望的时代。《史记》深刻激烈的批判精神和整体上的悲剧风格,是和这个时代的特点分不开的。

（二）司马迁的家世与生平

1. 家世家学渊源

司马迁出生在有史学传统的家庭。司马迁自称其先祖是颛顼时期的天官,《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周惠王、襄王时期,司马迁的祖上离开周朝到晋国,后来到秦国。

他的直系祖先是战国时期秦国著名的武将司马错。秦惠文王时期,司马错曾经在朝堂上与张仪辩论,辩论内容被收入《战国策·秦策》,后收入《古文观止》,名为《司马错论伐蜀》。辩论胜利后,秦惠文王派司马错等人出兵巴蜀,得胜而守之。

六世祖司马靳(司马错次孙)为名将武安君白起副手,参与长平之战,坑杀赵卒四十万人,司马错、司马靳的军事之功为秦国奠定了一统天下的军事基础。

高祖司马昌是秦始皇时的铁官。曾祖司马无泽,在汉初做过长安市的“市长”(负责管理市场的官员)。

祖父司马喜,没有做官,而有第九等爵位,为五大夫。

司马迁的父亲是西汉武帝时期太史令司马谈。司马谈是当时非常杰出的学者,著有《论六家要旨》一文,系统总结了春秋战国秦至汉初以来阴阳、儒、墨、法、名、道各家思想的利弊得失,并高度肯定道家思想。该文是对春秋战国以来的诸子百家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凝练总结。司马谈在约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至元封元年(前110年)任太史令。

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司马迁出生于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市),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司马谈曾想撰修一部史书,做太史令之后,就开始搜集阅读史料,为修史做准备。但是司马谈感到自己年事已高,要独立地修成一部史著,无论是时间、精力,还是史料积累都不太够,所以司马谈寄厚望于儿子司马迁,希望他能够早日参与其事,最终实现这样一个宏愿。司马迁早年即在文史职官的家庭氛围的熏陶与学者父亲的指导下悉心学习。

2. 少年时期的博览群书

据《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即是能阅读非汉代通行隶书所记载的籀文古籍,足见早慧与勤奋。十岁时,父亲司马谈到长安做了太史令,司马迁随父亲也到了长安,得以向儒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家学渊源既深,复从名师受业,启发诱导,获益不浅。这些学习经历不但为他日后创作《史记》奠定深厚的知识积累,也有利于他融汇取舍各家精华,领悟独出机杼的史识。后来担任太史令,他又利用工作上的方便,翻阅由国家收藏的各种文献资料。他阅读的范围非常广泛,上至古老的有关三代的典籍,下至西汉盛世司马相如等人的辞赋,至于诸子百家的著作、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的史料,乃至朝廷的公文档案,都是他的阅读对象。司马迁对于上述文献不是浮光掠影

式地浏览,而是认真地鉴别真伪,比较同异。比如,对于九州山川的记载,他认为《尚书·禹贡》是可靠的,而《山海经》等书则不可信。司马迁读过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发现的古文,认为其中关于孔子弟子的记载基本合乎事实。

3. 青年时期的游历及入仕

二十岁时,遵循父亲的指示,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开始漫游。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以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这次漫游历时二三年,足迹遍及黄河、长江流域。此后司马迁仕为郎中,随驾扈从,随汉武帝东达于碣石,见到了大海;西至空峒(今甘肃平凉),搜集黄帝的传说;到过北部边塞,登上了秦时所筑的长城;还参加了武帝带领群臣负薪塞河的活动。二十五岁时,以使者监军的身份,出使西南夷,担负起在西南设郡的任务,足迹遍及“邛、笮、昆明”等地。漫游大大拓展了司马迁的胸襟和视野,使他接触到各个阶层各种人物的生活,对社会和人生的观察、认识逐渐深入,并且搜集到许多历史人物的资料和传说,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还通过游历验证了许多历史传说。他到过浙江会稽,看了传说中太禹召集部落首领开会的地方;到过长沙,在汨罗江边凭吊爱国诗人屈原;到过曲阜,瞻仰孔子的墓,考察孔子讲学的遗址;到过汉高祖的故乡丰沛之地,参观萧何、曹参、樊哙、夏侯婴等人的故居,听取沛县父老讲述汉初布衣君臣发迹前后的轶事;在韩信的故乡淮阴,他也搜集了许多有关韩信的故事,如胯下之辱、漂母赐饭、葬母于高敞地;在孟尝君的故乡薛城,他考察了此地民风跟当年孟尝君好客养士的关系。这种游览和考察对他后来写作《史记》起了很大作用,使他获得了许许多多从古籍当中得不到的历史材料。今从《史记》各篇章中有关自述的稽考中获知,司马迁交游极为广泛,特别与亲历史实和熟悉史事者及其后人多有交往,如樊哙之孙樊他广、冯唐之子冯遂、苏武之父苏建、贾谊之孙贾嘉等,他从这些人处获取有价值的史料,加深了对传主的理解,从而使其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

4. 受父遗命修撰《史记》

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东巡至泰山,并在山上举行祭祀天地的封禅大典。司马谈当时因病留在洛阳,未能随行。身为史官却未能亲历这样的盛事,他深感遗憾,抑郁愤恨致病情加重。奉使西征的司马迁在完成任务后立即赶往泰山参加封禅大典,行到洛阳却见到了命垂旦夕的父亲。司马迁在为《史记》写的“自序”里,详细记录了司马谈在河、洛之间对他说的这番语重心长的嘱托。司马谈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

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流着眼泪对父亲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司马谈死后三年,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继父职为太史令,开始搜集材料,做写作上的准备。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参与制订了著名的《太初历》;就在这一年,开始了初名为《太史公书》的创作。

5. 壮年时期遭受官刑之辱

正当司马迁潜心创作之时,却遭受了不测横祸。天汉三年(前98年)司马迁48岁,因李陵事件而遭受官刑。李陵是西汉名将李广之孙,他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独率五千步卒,遭遇八万骑兵,浴血奋战,兵败投降,“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司马迁与李陵素无交往,但观其为人,察其形势,认为李陵兵败被俘,将会等待时机报答汉朝。适逢汉武帝召问,司马迁称说李陵的杀敌之功,为李陵辩护。辩护中说兵败被俘的原因是“救兵不至”,于是龙颜大怒,认为司马迁诋毁贰师将军。在此,“救兵”指贰师将军李广利,李广利是武帝宠姬李夫人之弟,皇亲兼宠臣。酷吏仰承人主脸色办事,给司马迁定为“诬上”之罪。“诬上”即诬蔑皇上的死罪。汉代可以用钱财赎罪,但司马迁“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为完成伟大的著述,他被迫接受了官刑。官刑比死刑更为耻辱,不仅是对身体的摧残,更是对人格的摧残和侮辱。遭此奇耻大辱,司马迁曾说:“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他忍辱负重地活下来,发愤著书。苦难和耻辱磨砺了司马迁的决心和意志,也加深了他对专制君主与人生的认识,这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史记》的风貌,使得司马迁的修史理想不再是总结历史和润饰鸿业,而是于人物传记中寄予自己的身世之叹和磊落不平之气,使《史记》这部书不仅仅是一部纪传体通史,还是作者带着心灵肉体创伤发出的倾诉。

6. 任中书令忍辱成书

三年以后,司马迁才遇赦出狱,出任中书令,忍受着极端的痛苦与愤懑,继续《史记》的创作。征和二年(前91年)司马迁55岁,此时所写的《报任安书》有“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凡百三十篇”之句,可见其时,司马迁基本完成了《史记》的写作。征和三年(前90年)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此事记载于《史记·匈奴列传》,是司马迁的绝笔。其后司马迁销声匿迹,不知所终。

二、《史记》的体例与写作宗旨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简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东汉中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演变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是《史记》的第一个传播者。在汉宣帝时,杨恽把《史记》献给朝廷,从此天下人得以共读这部伟大的史著。

《史记》全书130卷,即130篇,共50余万字,记载了上自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约三千年的历史。《史记》以前的史书皆为编年体或国别体,《史记》开创了纪传体,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和第一部传记文学名著。《史记》首篇《五帝本纪》从黄帝轩辕写起,即起于原始社会晚期,具体年限难以确考。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云:“今观《史记》中最晚之记事,得信为出自公手者,唯《匈奴列传》之李广利投匈奴事。”这是司马迁的绝笔。此事发生在汉武帝征和三年,即公元前90年,被公认为《史记》记史的下限。

《汉书》记载,司马迁死后,《史记》在流传过程中散失了十篇,仅存目录。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先生做了补充、修葺的工作,凡是他补写的《史记》,都有“褚先生曰”的字样。褚先生所补亦有精彩者,如《滑稽列传》中的“西门豹治邺”等,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说“言辞鄙陋”。

(一)《史记》的体例

《史记》全书包括五种体例: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计130篇,这五种体例构成了《史记》的体系。后来班固《汉书》去掉“世家”并入“传”,这样就只有“纪”“传”两种了。后世由此称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史书体裁为纪传体。这种体例成为历代正史的通用体裁。

“本纪”记载了五帝、夏、商、周、秦、西汉历代的帝王世系和重大事件,以事系年,编年记述了国家大事和兴亡的脉络。年代久远的以朝代为主,年代稍近的以帝王或实际当权者为主。“本纪”实质上是全国编年大事记,是全书总纲。

“世家”亦以编年为体,分别记载先秦各诸侯国和汉代有功之臣及个别杰出历史人物。其事或许并非牵涉全国,然于某一封国或全国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有巨大影响,多数可视为“国别史”,诸如《晋世家》《楚世家》《孔子世家》《陈涉世

家》等。

“本纪”“世家”主要以记述皇帝、诸侯王为主，但名号并非唯一分类标准，司马迁更重视客观实际。汉惠帝刘盈仁弱如傀儡，虽在位七年，却没有专载；项羽、吕雉皆无帝王名号，然曾实际行使帝王权力，故立为本纪。孔子思想后世影响巨深，陈涉反暴秦有首义之功，皆立为世家。

“列传”是历史上有影响的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人物传记。“列传”所占篇幅最多，计七十篇，可分两大类：一类是人物传记，有一人一传的专传，有两人或数人的合传，按人物性质排列立传。所记人物范围极广，涉及社会各个阶层。如《伯夷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刺客列传》《儒林列传》等。另一类是对外国与国内少数民族的记载，涉及中外关系史和国内民族关系史。如《匈奴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朝鲜列传》等。“列传”对“本纪”起了充实和具体化的作用。

“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也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表”以谱列帝王、诸侯、贵族、将相大臣的世系、爵位和简要政绩，以年代远近、史事繁简而别为世表、年表、月表。今人观之，也可分为大事表和人物表两类，诸如《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等。“表”的作用是形象、直观，便于观览，可补“本纪”“世家”“列传”之不足，又可省去不少文字，使记载免于烦冗。

“书”是有关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专门史。“书”分门别类记述历代历法、礼乐、封禅、水利、经济等典章制度，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史记》很重要的部分，诸如《礼书》《乐书》《历书》《河渠书》《平准书》等。其中尤以《平准书》最为精彩，记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汉朝经济政策的演变，开后代正史《食货志》之先河。

历来人们称《史记》是纪传体史书，强调本纪和列传的重要性。其实，作为全书的组成部分，表、书、世家都有本纪、列传不能代替的独立的价值，严格地说，它应是纪传志书体，是一种综合体史书。

（二）《史记》的写作宗旨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段话概括了他的修史理想，或者说是创作宗旨。

1. 究天人之际

究天人之际，即探讨天道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在时代氛围的笼罩下，司马迁思想中不可避免地受天命论的影响。从整体上看，他能从叙述史实出发，客观地反映人物的生平活动，基本上摆脱天道、天命思想的影响。司马迁不可能完全抛弃天人感应说，但是他却从人物传记的缜密分析中表现出了大胆的怀疑。

他强调天人相分，认为天道与人事是并不相感应的。好人不一定有好报；坏人

也不一定会有恶报。他在《伯夷列传》中对现实社会这种好人遭殃、坏人享福的不公平世道提出了愤怒的责问。

2. 通古今之变

通古今之变,是指通过对三千年历史的发展变化的考察来寻求促成这些变化的原因。

首先,表达了对历史发展变化的看法。五帝、三代因历史太久远,无法“论次其年月”。《三代世表》至《十二诸侯年表》,年代是“自共和迄孔子”,是“诸侯专政”“五霸更盛衰”。《六国年表》起于周元王(前475年),迄秦二世(前207年),当时的历史特点是“陪臣执政”“海内争于战功”“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秦楚之际月表》起于秦二世元年(前209年),至汉高祖五年(前202年),首尾八年。对这段历史,司马迁做了这样的总结:“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四表不仅首尾相衔,贯穿古今,且勾勒出了各个历史时代的特点,反映出司马迁对于历史进程的卓越见解。

其次,研究朝代国家的盛衰、兴亡的变化。这也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重点。《史记》详细记载了夏、商、周和秦、汉的兴亡,并揭示了各王朝兴亡变化的原因。“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太史公自序》)桀、纣、周“失其道”的“道”有治国之术的意思,但指的更多的应是道义、仁义,是统治天下、治理天下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秦“失其政”的“政”大概指的是具体意义上的政治举措。

3. 成一家之言

成一家之言,是指借史实以表达对历史、社会与人生的看法,寄托自己的理想。

在创作宗旨上,《史记》与先秦诸子书是息息相通的。司马迁以孔子的后继者自居,并以此自勉。他著作《史记》,不仅是写一部反映客观历史的信史,而且是要通过“史”的形式,言明自己的“一家之言”。以史论道,用史论政,通过史来抒发自己的理想抱负,表现自己对于政治、社会、人生等的独特看法。

三、司马迁的思想

（一）司马迁的总体思想特点

司马迁从小就接受儒家的思想教育,后来又拜名儒董仲舒、孔安国为师,研读《公羊春秋》和古文《尚书》。他在二十岁左右壮游时,特地去朝拜了孔子的故乡,瞻仰了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遗风,乡射邹、峰”(《史记·太史公自序》),以致“低回留之不能去”。因此,在《史记》中,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深。司马迁对儒家思想的吸收继承,主要表现在推崇其主张的“仁爱”精神,具体如以民为本、为政以德、大一统等方面。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他是一位精通道家学说的人物,极力推崇道家对百家的兼容性,他在《论六家要旨》一文中开篇就说:“《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可以推断,司马迁受过道家学术的教育和影响,道家思想在司马迁的心路历程、成长道路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史记》不仅在《太史公自序》中收录了《论六家要旨》,而且对黄老思想倍加推崇,并贯穿全书始终。《史记》主要吸收了黄老学派道法自然思想,具体表现为因循为用、无为而治、从民所欲等方面。

总之,司马迁思想的基本倾向是儒道合一,对儒家、黄老二家均有所吸收,这种儒道互补的特征,或直接或间接地贯穿于司马迁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经济思想、史学思想等各个方面。

（二）司马迁的哲学思想

司马迁与《史记》的哲学思想根基为朴素唯物主义。他吸收道家的宇宙观和辩证法,认为创造人类万物的是充斥于天地宇宙间的混沌之气,而不是天帝神灵。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以“元气说”解释万物的产生及人类的生死现象。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指出:“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返,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这种宇宙观与老庄相合。《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